

【学界往事】

□吕家乡

高兰先生(1909—1987)的朗诵诗,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我就读到了。那是1945年春,我在萧县中学上初中。这是一所抗日游击学校,没有校舍,没有教室,借用民房上课和住宿,当然更没有桌凳,学生每人自备马扎和桐木写字板,晴天时,课堂就在村头小树林里,老师把小黑板挂在树上。语文课没有统一教材,用的是油印的讲义,其中就有高兰的长篇朗诵诗《我的家在黑龙江》。在抗日环境中读这篇洋溢着抗日热情的诗篇怎不让我们热血沸腾?不但在课堂上学,还在课外多次排练朗诵,当时可以把全篇熟练地背诵下来,由此我对新诗和新诗人产生了好感。由于这首诗的内容和篇幅都很有气势,我想作者一定也是高大魁伟的。

和高兰先生见面是在1951年春,华东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合并,原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兰,合校后担任中文系副主任。我当时读大二,虽然没听过他的课,但是经常看到他。和我的设想不同,他并不高大威武,而是文质彬彬,而且没有“老革命”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总是和颜悦色、笑眯眯的,这也和我的设想不同。后来听说,他是在1950年才到华大任教的,并不把自己看成改造别人的革命干部,而是以需要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自居。

有一次全系开联欢会,他朗诵了《我的生活好好好》,大家热烈鼓掌之后,高喊“再来一个”,他接着又说了一个政治笑话(可能是他自编的):有一天,美国特使马歇尔和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一块坐飞机从北京往南京飞,都显得愁眉苦脸,翻译官为了调剂情绪,就说:咱想一想高兴的事儿吧。外交部长说:我如果把一些糖块撒下去,捡到糖块的孩子一定很高兴,我也高兴。马歇尔说:我如果把一包包面粉撒下去,捡到面粉的中国老百姓一定很高兴,我也高兴。这时候飞机驾驶员开口了,说:我如果把你们都摔下去,全世界人民一定很高兴,我也高兴!这个笑话达到了政治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记得会后樊庆荣同学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特地推荐这个笑话。

【域外走笔】

□王佐良

德国拜罗伊特一年一度的瓦格纳歌剧节举世闻名。2007年我们一行山东艺术家刚到班贝格国际艺术家之家,主任高德曼先生就喋喋不休地宣扬歌剧节的票如何如何难买,一直把我们的胃口吊到了嗓子眼。就在歌剧节已经开始,世界各地的歌剧迷们蜂拥向拜罗伊特的时候,高德曼先生终于召集我们开会,说,经过他的努力,也因为他与班贝格县的县长、上法兰肯地区的议长有特特的关系,才为我们买到了歌剧节的票!不过,我们不能一起去,因为票是分开的,一天只有两张!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分别看瓦格纳系列歌剧的其中一个剧。

那一天,我和爱人早早赶到火车站。我们提前买好了廉价的巴州票,一张票可以五个人同乘,而且可以来回。

当列车进站,车站管理人员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个一身铁路制服的女士一边用力挥动手臂,一边大声喊着,往这儿!往这儿!我们原本想上轮椅车厢,经她这么一喊,也就飞跑着上了普通车厢。等我把爱人抱上车坐好,再把轮椅搬到车厢里,车门贴着轮椅的轮子上,徐徐开动。

我们兴奋着,这是第一次

高兰先生



▲左五为高兰先生。

大约1956年,我在济南工作,读了高兰新出的一本朗诵诗选,所收的多是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我写了一篇评论,肯定了《我的生活好好好》等少数诗篇,把大部分诗篇判为“政治性有余而诗味太少”,寄给孙昌熙先生请教。他回信说:你对高兰的朗诵诗肯定太少,如果以肯定为主,我就推荐给《文史哲》了……想不到1957年高兰和我一样也成了右派分子。不过由于他情节较轻,态度较好,仍然保留省人大代表资格,作为一种特殊标本。

1964年,我在山师附中教书,高兰的女儿郭君玲是我的学生,品学兼优,写作能力和艺术表演才能尤其突出。年底举行全校联欢晚会,有郭君玲的重头节目,高兰先生和师母一块来看。限于我们两人的政治身份,我对老师只有礼貌性的寒暄,但内心感到很亲切。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请他表演朗诵,想了想还是没有提。

改革开放后,高兰和我都得到新生,而且先后实现了入党的夙愿。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成立后,高兰被推选为会长,我是副会长之一,接触多了,感到他的确焕发了精神上的青春。作为七十多岁的病号,他除了带研究生,还经常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到会总要准备论文和发言。他作为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的会长,我们本来只希望他掌舵就行,不必太操心,他却是名副其实,真抓实干,每次召开年

会前后,他都郑重地向省社联请示、汇报,从议题到开支都有切实计划。他所主持的两次研讨会(1984年在威海,1985年在泰安),都要求每一个到会者有准备而来、为研讨而来,做到了紧凑、充实、节约,规模小、学术性强,促进了全省学术界的郭沫若研究,而且产生了全国性影响。那几年,“清除精神污染”之类的风声时紧时松,政治气候阴晴不定,在郭沫若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研讨中,高兰既注意掌握大方向,又切实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对于某些“另类”的看法,他绝不扣帽子,总是提醒作者“要慎重”。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不是表示他的“心有余悸”或“观念保守”,而是出自他对晚辈的关爱。

1984年7月在威海召开研讨会期间,出了一个有趣而尴尬的插曲。一天下午,我们到威海郊区的远遥大队参观。那里实行了综合经营(当时还没有“商品经济”的提法),社员人均年收入达780元(我家的人均年收入仅240元),几乎家家住上了新建的小洋楼,室内瓷砖铺地,院子里花木鲜美,厨房、卫生间、储藏室及各种电器一应俱全,富裕情况让人惊喜。高兰先生激情满怀,应邀挥毫写下了“远遥大队,遥遥领先”的大幅题词。大队书记邀请我们在那里的饭店用餐,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得到优惠,就欣然同意。晚餐分两桌,确实很丰盛,吃到了新鲜的牡蛎、海虹、大对虾、甲鱼、螃蟹,还有鱼饺子和海

换车

在德国看歌剧,我们早就知道瓦格纳的歌剧名闻遐迩,也听说瓦格纳节庆剧院非同一般,在我们的心目中,它应该壮丽宏伟、气势逼人,就像国内的大剧院那样。列车轻快地前行,德国的田野、村庄、小镇在眼前不断地闪过,正值七月,一派派柔和煦的夏日气象,看得我们入迷。

不知不觉,行程即将过半,这时,列车员出现了,一看我们,她突然表现得很诧异,犹豫了一下,她还是问了:你们到哪里去?

我们去拜罗伊特。我回答。错了!她说。

我们愕然。

我们的车次没错呀。

错了。她又说。她说完指了指过道门上方的小显示屏,上面清晰地显示着“HOF”(霍夫)。

这是到霍夫去的,你们必须尽快换到去拜罗伊特的车厢。她边说边比划着,说完,她走了。

我们并不在意。我们的车票是去拜罗伊特的,坐的是正确的车次,应该没问题。

列车继续前行,女列车员又出现了。

你们还在这儿?赶快到前面去,到前面车厢去!

看她坚决的样子,我们才意识到可能问题比较严重,立刻准备,收拾行囊,让爱人坐上轮椅。然后向列车前进方向移动,可是,过道太窄了,轮椅过不去,我急忙把轮椅的两个大后轮拆下来,提在手上,用小轮子前行,列车里的其他乘客见状,纷纷把身体让到一边,让我们通过。

可是,我们没能进入前往拜罗伊特的车厢,因为,为了安全,通往前方车厢的门是封闭的。

过了一会儿,女列车员又出现了。

哎呀,你们还在这儿!

她真急了。这时列车停车。快快!她喊道,示意我把爱人放到座位上,我们两个先把轮椅抬下车,然后我把爱人抱下去,我刚刚站稳脚,列车车门自动关上,缓缓开动了!

哎呀,这怎么办呀!

女列车员也急了,她挥手拍打车厢,又迈开步子紧紧跟上正在行驶的列车,猛按车门上的一个红色大按钮,可是,列车根本没有反应,越开越快,我推着轮椅在后面疯跑,眼看就追不上了。这时,女列车员站住了,她掏出手机呼叫,没用,她使出了最后一招,举起右手

参汤。看到大队书记作陪,我们以为肯定是免费招待,真是越吃越高兴。不料饭后正要离席,饭店服务员拿来了账单,我们十几个人这一顿饭竟要290元,并且声明大队书记的那一份饭费已经扣除。我那时月工资84元,这一顿饭费相当于我三个半月的工资。这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好几个人倾囊才凑够。归途中大家颇懊丧,高兰强为笑颜说:什么是综合经营?我们都没见过,这可是新鲜事物,代表发展方向,我们对新事物要真心支持,可不要叶公好龙呀!几句话把沉重的空气稀释了。我当时想,如果高兰就这次参观过程写一首朗诵诗,其中的感情内容肯定比“好好好”要复杂得多了。

高兰的糖尿病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1985年5月泰安研讨会后,他就不能再出外开会了。1987年夏天,他住进医院,我去看望他,他已浮肿又虚弱,双脚溃烂,无法走动,但精神仍然健旺,关心郭沫若研究会的会务,关心我的教学和研究情况。他这次住院再没能出来,值得庆幸的是,他临终前如愿以偿地看到了他亲自编选的朗诵诗选集(所收主要是早期诗作)和他早年所写的《李后主评传》得以出版,这些著作说明他晚年进入了否定之否定的新境界。历来在文人中流行着“悔其少作”的说法,高兰的“少作”却成了他晚年最看重的成果,我不知他心头是怎样的滋味。

为了以实际行动纪念高兰先生,在他去世后,我搜集并研读了他的全部诗作,写出了论文《高兰朗诵诗:追求诗与时代的契合点》。我觉得他晚年自编的选集多收抗日期间的旧作而少收解放后的诗作是取舍恰当的,因为他在抗战期间通过亲身感受,准确把握了诗与时代的契合点,在创作实践中较好地做到了时代需要和心灵需要的统一、大众化和个性化的统一、俗和雅的统一,而他后来的诗作却出现了重政治而轻艺术的偏颇。我把论文给孙昌熙先生看了,他说:你成了高兰先生的知音,他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向前方不停地空中画圆圈。这一招果然灵,司机从机车的车窗里探头回望,列车慢慢地停住了,车门打开,我们上车,当列车再次开动的时候,三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

原来,这趟列车在中途会分开,一南一北开往两个不同的方向,前方的车头拉着前半截列车掉头往南,开往拜罗伊特,而后半截列车则由另一个车头拉着,继续往北开往霍夫。

爱人说,坐过这么多次火车,还第一次碰到开动的列车又为乘客停下的。德国铁路的服务,真的非同寻常。

我们顺利到达拜罗伊特,观看了瓦格纳的《尼贝龙根的指环》系列歌剧中的一个剧《齐格弗里德》。不过,瓦格纳节庆剧院远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宏伟壮丽,从外表看上去很普通,里面的声音效果倒是无可挑剔,演员不用麦克风,剧场不用扩音器材,照样声音清晰响亮,而且楼上楼下的效果一样好。演员的演唱和乐队、灯光、布景的置换等等是真正的欧洲一流水准。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可是那一次乘火车的经历还不时浮现脑海,成为珍藏的记忆了。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

汉代贾谊在《新书》中讲了一个国王吞吃虫子的故事:有一次,楚惠王进餐时在饭中吃到一条蚂蟥,他犹豫了一下,硬着头皮将蚂蟥吞下肚中,遂生病不能进食。属下问他因何得病,他说:“我吃饭时吃到一条蚂蟥。我若追究此事而不对有关人员治罪,便有损法律尊严;如果追究并加以惩处,那么厨师等多人都要被杀掉。我不忍心这样做,但又怕人们说我不依法律办事,所以就偷偷将蚂蟥吞进了肚里……”

这位楚惠王如此仁德,着实可敬可爱。但他将蚂蟥吞进肚里,却不是最佳选择,不值得人们效法。相比较

【读史札记】

吞虫·“吃肉”·“偷钱”

□戴永夏

而言,有人遇到此类情况,却处理得比他高明。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一位高僧受某大帅邀请,前往赴素宴。席间,高僧发现在满桌精致的素肴中有盘菜里竟然有一块猪肉,显然这是对佛的亵渎。他的徒弟故意用筷子把肉翻出来,高僧却立刻把肉用菜盖起来。一会儿,徒弟又把猪肉翻出来,打算让大帅看到;高僧再度把肉遮盖起来,并在徒弟的耳畔轻声说:“如果你再把肉翻出来,我就把它吃掉!”徒弟受到警告后,再也不敢把肉翻出来了。

宴席结束后,高僧辞别了大帅。归途中,徒弟不解地问:“师父,刚才那厨子明明知道我们不吃肉,为什么把猪肉放在素菜中?我当时只想让大帅知道,处罚他一下。”高僧说:“每个人都会犯错,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如果刚才大帅看见了猪肉,盛怒之下把厨师枪毙或重罚,这岂是我愿见到的?为此,我宁可把肉吃掉,也要保护他们……”徒弟听后恍然大悟,把师父的话牢记心中。

楚惠王也好,高僧也罢,一片好心救助别人,其善行美德一目了然,人见人赞。然而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情况,好心为人着想不但得不到理解,还会遭受误解,甚至蒙受不白之冤。《禅的智慧》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朝初年,江苏常州城里出了一个魏神医。有一次,魏神医到了一个危重病人家看病,他走后,病人枕头下放的十两银子不见了。病人的儿子怀疑是魏神医拿了救命钱,便捧了一炷香,跪倒在魏神医的门前,让他还钱。魏神医听了他的诉说,便痛快地承认下来,并拿出十两银子送给他。这一来,人们对魏神医的非议之声传遍大街小巷,然而魏神医却毫不在意。半月后,病人痊愈,在褥子底下发现了那十两银子。于是,父子俩又跪倒在魏神医面前,痛哭流涕地说:“我们家的银子并未丢失,是我们诬陷了先生。”魏神医将他们扶了起来,并未怪罪他们。病人的儿子不解地问:“为什么您没拿我家银子,却承认拿了,甘愿忍辱挨骂呢?”魏神医说:“当时,你父亲的病情正在紧要关头,若找不到丢失的银子,一定会邪火上攻,病情加重,很可能一命呜呼。所以,我宁肯背上骂名,也要挽救他的生命。”

魏神医在蒙受冤屈、遭人辱骂的情况下,仍无怨无悔、矢志不渝地治病救人,其医德之高、精神之美,足可彪炳青史,传之千古。而他的榜样力量和启发意义,又远在实际意义之上!

人生在世,谁都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任何人都要依赖于他人的存在而生存。这就决定了人在处理自身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而必须同时考虑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多为他人着想,尽力去帮助别人。惟其如此,社会才能更加美好,人生也才能更有意义。在这方面,许多时代先锋传承了古人的美德,融入了新的观念,为我们做出榜样。雷锋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曾说:“我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是他的榜样力量,影响了整个社会,助推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时代新风。而这种新风,也使过去只有少数人具有的“多为别人着想”的传统美德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发扬,使之更具群众性和普遍性,成为更多人的自觉行动。

(本文作者为作家、编审)